

礼赞新时代 奋进新征程

【重报艺文志】

鲁迅文学奖得主张者：

带上“野心”去幸福地写作



张春晓 摄/视觉重庆

人物名片

张者，国家一级作家，重庆市作协副主席、重庆文学院专业作家。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桃李》《桃花》《桃夭》《零炮楼》《老风口》等，曾获庄重文文学奖、《小说月报》百花奖、重庆文学奖、茅盾文学奖入围。2022年，短篇小说《山前该有一棵树》获鲁迅文学奖。

□赵欣

故事从2020年春说起。在重庆嘉陵江北岸的寓所里，作家张者一边喝茶，一边如往常一样，透过落地窗与鹤岭相望。鹤岭山脚的嘉陵江南岸，在建中的重庆第一高楼正在施工。数个塔吊在空中向四面八方伸展，恍如树枝般又高、又细、又长。张者眼里，那栋“楼”化作了一棵“树”，正在生长。他的思绪开始飞翔。忽然间，他想起戈壁滩上的胡杨，传说中它三千年不死，死后三千年不倒，倒后三千年不朽。那是个看似寻常的春末早上，疫情渐散，我和全国人民一样，刚刚经历过一段居家抗疫的时期。那段日子我每天远眺对岸的鹤岭，我发现无论风云如何变幻，鹤岭始终沉默矗立，不发一语，兀自有力，这气质让我想起童年常见的胡杨，它们亘古而神秘。由山及树，再想到人，似乎有种共通的精神信仰——百折不挠，向死而生。这信仰多么值得致敬。2022年9月，回到那间面朝鹤岭的书房，张者接受了笔者专访，他如此诗意地回忆起短篇小说《山前该有一棵树》的写作缘起。但他也笑着补充，创作冲动来临时绝非如此云淡风轻，真实的感受，是“如同胸中刮起了飓风，表达的欲望在持续地翻滚奔涌”。那些伴随激烈情感奔袭至笔端的文字构筑成张者对故乡的一棵树的回望与想象，最终为他斩获了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至此，张者又一次在文学之路上迎来了高光。这份光荣同样属于重庆，重庆文学因此实现了在鲁迅文学奖小说门类零的突破。

写的是—棵树，又远不止—棵树

为这棵根植于记忆里的胡杨展开叙事，张者酝酿已久。写下《山前该有一棵树》这个标题后，他的思绪回到了童年时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那个个花草难觅、荒凉遍地的深山矿区。他去新疆寻找父母，之前在河南信阳出生成长。对年幼的他来讲，这趟从中原前往边疆的旅行就像“一场意料之中又始料未及的‘放逐’”，夹杂着某种悲情和极大的不确定性。“我出生后父亲去了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后来母亲也跟去了，于是我被托付给外婆，在农村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那段时间有两个关键词：饥饿和快乐。可能是小孩子长身体吧，我总感觉吃不饱，只要闻到村里哪家厨房有香气就会直奔而去，反正村里都是亲戚。因为我远在新疆，整个村子的大人都疼我宠我。我上房揭瓦，下塘摸虾，翻墙摘杏，下地偷瓜……特别淘气，外婆生气时要管教我，却又抓不住我，她裹着小脚走路很慢，我总是蹭一下就跑得无影无踪。”能让张者安静下来的是在大队做会计的外公。“我印象很深的一个画面，是外公下班回家时，夕阳西下，我迎面冲去抱住他，他就从口袋里掏出一颗水果糖给我，那真是甜蜜的回忆。”跟着外公，张者还学写毛笔字描红。已经工作的两个舅舅也是那个年代少见的高中毕业生，他们爱书的习惯影响了张者，“后来去新疆，我的一大包行李都是最爱的连环画。”带着巨大的难过远赴建设兵团，至少有一年的时间，张者都哭着喊着回河南。但他已经到了年龄，只能留在父母身边。“兵团每十天休息一天，称为‘大礼拜’，所以父母都很忙，没空管我，我反而要帮着看管在新疆出生的弟妹。一年多过去，我才慢慢适应兵团生活。”在《山前该有一棵树》里，张者奉献了他童年的记忆点滴。以新疆矿区为背景，他讲述了围绕移植一棵茂密而孤独的胡杨树到学校而发生的故事。那所用石头、红柳枝和油毡搭建的简陋学校，是他曾求学的地方，那棵顽强的胡杨的移栽过程，他也曾亲身经历过。

“为什么几十年过去了我还对那棵树念念不忘？因为当时在寸草不生的天山南坡那个山沟里，我们太需要一棵树了。一棵树有时比水更重要。一口水只能解一时之渴，一棵树却能带来永远的绿荫。水关乎我们的生命，树却关系到我们的心灵，这不仅仅是遮荫那么简单。人类是从树上下来的，树是人类真正的精神原乡。”这些思考，张者借小说里教语文的胡老师布置作文《树》的情节予以了表达。让一群在没有树的环境下生活的孩子写树，多少有些“残酷”，他的叙述却为“残酷”平添了几分诗意：“胡老师就说，眼前没树，心中难道没有树吗？回家问问父母吧……同学们就写了很多不一样的树……父母们都是有故乡的人，他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屯垦戍边来到了新疆。他们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一棵树，而每一种树都寄托着他们的乡愁。比方：写黄葛树的父亲是四川人，写大槐树的父母是北京人，写大榕树的老家是福建人……我爹是河南人，他给我讲了门前大桑树的故事。”“动笔写这一棵树，才发现我写的远不止这一棵树，甚至写出的不仅是我，本质还是人。”张者坦言，随着文本的推进，他意识到并非树本身令他魂牵梦萦多年，他难忘的是那个生存环境极不完美之地和树的生存，因为“从完美中发现完美，便是爱这世界的样子”。

道是不是某种巧合，张者在重庆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也与树有关。

“我远道而来，在西师蛰伏了一年没写东西。”他笑着回忆，这篇处女作是关于黄葛树的散文，“这树挺有意思，冬天发芽冬天落叶，我从重庆的树想到河南和新疆的树，人生的经历就这样与文学创作第一次合流了。”离开校园，张者先是留在重庆做记者，后到北大念法律系研究生，北大毕业后又成为《南方周末》记者。兜兜转转几十年，无论身处何种角色，文学创作从未远离他的生活。与杨绛先生的一段交往，令张者终生难忘，也是他坚持创作的一股精神力量。那是2002年，他在撰写一个文化老人系列的抢救性采访，91岁的杨绛是他希望采访的对象。“杨绛与钱钟书先生一样低调，起初对我是拒绝的。后来我说，‘我来找您，身份不是记者，而是写作者。’她说，‘那你把作品给我看看吧。’寄了作品，一个月后，她联系我，口气软了，称我‘张者小友’，说‘我们见面吧’。我激动地问啥时候见，她淡淡地说，‘等秋风凉了吧。’等到第一场秋雨下来，我赶紧打去电话，她说，‘行啊，找个好天气吧。’后来我就去她家聊了一天。那天，保姆时不时提醒老太太别说了当心累着，她却道，‘别管我，今儿我高兴。’杨绛与张者聊了很多，聊起钱钟书先生和《围城》，她说当时钱先生做学问，有段时间累了，于是写起了小说。杨先生说钱先生，‘你这不是胡闹嘛？’钱先生回说，‘就是胡闹啊。’结果这一胡闹就闹出了现代文学经典《围城》。我问她，‘那您觉得我也在胡闹吗？’她笑了，‘你不是胡闹，你没像钱书那样做研究呀，你是纯粹的作家。’她还鼓励我，‘张者小友，好好写啊，这条路很长很苦，挣不到钱的，要加油哦。’后来《桃李》出版，她也饶有兴致地翻看过，还为我写几句话，这些珍贵的记忆，都是我多年坚持的巨大动力。”

对中国文学有信心，也有野心

与杨绛初见那一年，张者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桃李》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成为中国文坛一桩具有影响力的事件。以诙谐讽刺的文笔，《桃李》将目光对准某名牌大学的高级知识分子群体，将上世纪90年代象牙塔内的光怪陆离展现得淋漓尽致，被认为是一本“校园红楼梦”。北大教授谢冕、评论家孟繁华等对《桃李》评价颇高。孟繁华甚至说，《桃李》让他想起《围城》等“五四”前后关于知识分子的小说，“知识分子阶层，内心有很多不足为外人道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又被他们的一些非常斯文的话语给遮蔽掉了。比如无处不在的现代性的焦虑。”评论界的关注让张者感激，也让他有些困惑。“写作是多么幸福的事儿啊，好玩儿、痛快、过瘾，通过把听到的故事讲出来，我能由衷体会到一种叙事快感，就算有戏谑和调侃，那也是善意的。”他也承认，一部作品有着不断生长的过程，“作家写作、读者阅读、批评家批评，过程中会生出很多作者没有想到的层面，但作家写作时肯定只会基于小说本身内容出发，不太可能预设哲学命题，写作完成后的事情就不是作者可以控制的了。”事实上，比《桃李》更早几年，张者这个名字就曾引起文坛注意。那时他在重庆做记者，一有闲暇就写小说。日积月累，竟也写了不少东西。他以河南和新疆为题材，陆续完成《老家的风景》《老调》《老灯》《苦泉水》等中篇小说在1994年的《红岩》刊发，两篇上了头条，《苦泉水》还被《中篇小说选刊》转载。为了走得更远，他决定进京，去北京大学读研。《桃李》让张者一举成名。在由全国百家媒体、著名学者和评论家参与的“2003年度中华文学人物”评选中，他获评“最具潜质的青年作家”。颁奖词写道：“张者是消费时代里知识分子命运的独特书写者，他敏锐地意识到新语

道不是某种巧合，张者在重庆发表的第一篇作品，也与树有关。

“我远道而来，在西师蛰伏了一年没写东西。”他笑着回忆，这篇处女作是关于黄葛树的散文，“这树挺有意思，冬天发芽冬天落叶，我从重庆的树想到河南和新疆的树，人生的经历就这样与文学创作第一次合流了。”离开校园，张者先是留在重庆做记者，后到北大念法律系研究生，北大毕业后又成为《南方周末》记者。兜兜转转几十年，无论身处何种角色，文学创作从未远离他的生活。与杨绛先生的一段交往，令张者终生难忘，也是他坚持创作的一股精神力量。那是2002年，他在撰写一个文化老人系列的抢救性采访，91岁的杨绛是他希望采访的对象。“杨绛与钱钟书先生一样低调，起初对我是拒绝的。后来我说，‘我来找您，身份不是记者，而是写作者。’她说，‘那你把作品给我看看吧。’寄了作品，一个月后，她联系我，口气软了，称我‘张者小友’，说‘我们见面吧’。我激动地问啥时候见，她淡淡地说，‘等秋风凉了吧。’等到第一场秋雨下来，我赶紧打去电话，她说，‘行啊，找个好天气吧。’后来我就去她家聊了一天。那天，保姆时不时提醒老太太别说了当心累着，她却道，‘别管我，今儿我高兴。’杨绛与张者聊了很多，聊起钱钟书先生和《围城》，她说当时钱先生做学问，有段时间累了，于是写起了小说。杨先生说钱先生，‘你这不是胡闹嘛？’钱先生回说，‘就是胡闹啊。’结果这一胡闹就闹出了现代文学经典《围城》。我问她，‘那您觉得我也在胡闹吗？’她笑了，‘你不是胡闹，你没像钱书那样做研究呀，你是纯粹的作家。’她还鼓励我，‘张者小友，好好写啊，这条路很长很苦，挣不到钱的，要加油哦。’后来《桃李》出版，她也饶有兴致地翻看过，还为我写几句话，这些珍贵的记忆，都是我多年坚持的巨大动力。”

对中国文学有信心，也有野心

与杨绛初见那一年，张者的长篇小说处女作《桃李》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成为中国文坛一桩具有影响力的事件。以诙谐讽刺的文笔，《桃李》将目光对准某名牌大学的高级知识分子群体，将上世纪90年代象牙塔内的光怪陆离展现得淋漓尽致，被认为是一本“校园红楼梦”。北大教授谢冕、评论家孟繁华等对《桃李》评价颇高。孟繁华甚至说，《桃李》让他想起《围城》等“五四”前后关于知识分子的小说，“知识分子阶层，内心有很多不足为外人道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又被他们的一些非常斯文的话语给遮蔽掉了。比如无处不在的现代性的焦虑。”评论界的关注让张者感激，也让他有些困惑。“写作是多么幸福的事儿啊，好玩儿、痛快、过瘾，通过把听到的故事讲出来，我能由衷体会到一种叙事快感，就算有戏谑和调侃，那也是善意的。”他也承认，一部作品有着不断生长的过程，“作家写作、读者阅读、批评家批评，过程中会生出很多作者没有想到的层面，但作家写作时肯定只会基于小说本身内容出发，不太可能预设哲学命题，写作完成后的事情就不是作者可以控制的了。”事实上，比《桃李》更早几年，张者这个名字就曾引起文坛注意。那时他在重庆做记者，一有闲暇就写小说。日积月累，竟也写了不少东西。他以河南和新疆为题材，陆续完成《老